

近年来中国人口与就业热点问题研究

张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本文通过对近几年已发表文献的述评,总结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转变状况研究的基本结论,认为中国人口政策应该进入调整期。另外,伴随“低生育水平”的长期维持,两个非常重要的就业群体——农民工与大学生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就业问题。农民工的“招工难”,源于劳动力人口供给数量的逐年递减。而大学生的“就业难”,则直接产生于扩招所引发的结构性竞争压力。同时,亦对农民工面临的劳资关系进行了文献梳理,对高等教育扩招中存在的教育与就业公平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人口转变; 民工荒; 大学生就业难

[作者简介] 张翼(1964—),男,甘肃省静宁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劳动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社会保障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71(2011)04-0128-06 [收稿日期] 2011-03-28

人口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劳动力人口的总量供给。因此,近期人口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分析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的基础上,预测未来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并借此向调控人口的主体——国家与政府提出政策性建议。但在人口发展态势已经明确的同时,劳动力人口结构的变化则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就业状况。正因为这些结构性变化的存在,才使得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问题显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色。本文将在分析人口结构转变的基础上,重点评述学术界对这两个群体的研究进展,即中国人口是否发生了重大转变?转变趋势如何?这些结构性的转变又是如何影响当前的就业与收入分配?

一、低生育率、人口转变与人口政策的调整

大约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界就形成了基本共识——中国已进入到低生育水平时期——2011年4月28日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第1号数据公报,再次证实了中国步入低生育水平时期所发生的转变特征。现在,中国人口已经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稳定过渡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从最近几年表现出的基本趋势可以看出,人口死亡率开始高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中国每年净增人口数在继续缩小。

人口转变的发生,使越来越多的人加深了“中国已

步入低生育水平”时期的共识。但这个共识并未消除研究中存在的激烈争论:什么是低生育水平?为促使中国社会与经济顺利发展,我们应该将“低生育水平”维持在何种程度?而相应的人口政策又应做何调整?由此可见,人口政策调整与否的关键点是对当前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计,学术界的研究正是集中在这一问题上全面展开。不同的学者因对该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存在矛盾,而使其政策性结论也大相径庭。

那么,何为低生育水平呢?一般而言,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如果降低到2.1,则被认为进入到更替生育时期。如果低于2.1,则会逐渐过渡到人口净减少时期——总和生育率越低,未来净减少的速度就越快;而越接近2.1,则人口维持更替生育水平的时期越长。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3左右。但因为存在年龄较小人口群的漏报情况,故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很少被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采用。按照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说法,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整个1990年代都在1.8左右。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中国大陆现有13.39亿人口的结论,比此前——2011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字——13.41亿人少了很多——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总和生育率真的会很低。

2006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再次主持人

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这项涉及 1200 个村(居委会)、44572 个家庭户、33257 名育龄妇女的调查在 2007 年发布了主要数据公报(2007 年第 2 号)。该公报对 2004、2005 以及 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 8 月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分别是 1.59、1.74 和 1.87 并认为其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初婚堆积和出生堆积。调查得到的这个数据正好印证了 200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论断,因为低生育水平很可能会因为总和生育率的上升而变得“不稳定”。

那么 这个调查得到的结论可信吗? 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或总和生育率有没有反弹? 郭志刚为厘清其中的原委连续撰文 认为“2006 年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样本明显有偏”,“有关生育率回升”的判断不能反映实际 也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1]。随后 郭志刚又撰文指出“人口调查统计结果与政府指导口径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别”,“这种困境状态至今已经延续了近 20 年”。也就是说 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实际大大低于 1.8, 大约在 1.5~1.6 之间^[2]。但 2000 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及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所显示的数据分别为 1.27 和 1.34。这已经极其趋近于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西欧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另外 联合国人口司出版的《世界生育率模式 2007》中 也将中国 2004 年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 1.4 美国人口咨询局《2007 世界人口数据库》将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估计在 1.6 左右。这些数据都低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经常使用的 1.8。

如何看待学术界与政府数据之间的“打架问题”? 如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真的很低的话 那么 现行的旨在限制生育与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配置值就得反思。毕竟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会进一步加速中国的老龄化进程 使“未富先老”的矛盾愈加突出。因此 总和生育率之争表面上看是数据之争 但本质上却预示着学术界与政府部门对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改革的取向之争。正因为如此 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才在近几年非常集中。如顾宝昌与王丰发现 在实行二孩儿生育政策的地区 如甘肃的酒泉、山西的翼城、河北的承德、湖北的恩施等地 虽然计生政策比较宽松 但人口却保持了低增长态势 其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从未达到 2 (即未达到普遍生育两个孩子)——不但没有出现生育反弹的结果 而且还防止了出生性别比的攀升^[3]。该研究的结论极其明确——如果实行二孩儿加间隔的生育政策 则不必太过担忧“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会大幅反弹”的问题。曾毅在系统研究后建议 在 2012—

2015 年前后 实行二孩儿加晚育政策软着陆^[4]。

郑真真在调研中也发现 人们的意愿生育率开始走低^[5]。宋健与陈芳的研究发现 在城市青年中 人们的实际生育率远远低于意愿生育率。初育年龄的推迟、人口流动率的增加等 明显延缓与阻滞了青年的生育行为^[6]。另外一些研究 还将中国人口转型、人口出生率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 旨在讨论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是否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如王金营认为,“过低的生育水平并不能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从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战略上来看 保持相对稳定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生育水平才是最优选择……应该在‘十二五’期间允许育龄人群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严格控制三个孩子……使未来的生育水平稳定在 1.9~2.0 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上”^[7]。汪伟通过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的分析 肯定了计划生育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 同时也指出,“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深 家庭的养老负担加重 遗赠储蓄也会减少……生育政策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也越来越小 因此计划生育继续严格执行的理由可能会受到挑战”。“中国应当从政策设计上未雨绸缪 在不久的将来适当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8]。

应该说 在死亡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 出生率的降低——或者总和生育率的降低 会造成人口金字塔的收缩 在人口转变中进一步影响劳动力人口、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的结构状况^[9]。毕竟 今天的少儿人口就是明天的劳动力人口。中国在人口出生高峰时期形成的人口红利 增强了中国对国际产业的竞争力 使中国成长为制造业大国 并促使了中国经济长达 30 年的高速增长。但中国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 却也带来了时下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增量的递减——在 2010 年新增加的劳动力人口大约为 400—500 万人——大约在 2020 年前后 劳动力人口会趋于“零增长” 然后会逐渐下滑。正因为如此 蔡昉才通过一系列研究说明 中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正在逐渐消失 中国的第一次人口红利 会在人口转型过程中逐渐式微 为避免“人口负债” 中国需要通过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 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10]。田雪原也提出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改革办法 即“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的情况下 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这不会造成生育水平的大幅度反弹 还对于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具有积极作用”^[11]。在很多学者建议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 程恩富与王建新认为,“不断增加的中国人口总量正在逼近国内主要资

源所能承载的极限……正在逼近国内生态安全所能承载的极限……因此,在人口尚未收缩到适度规模(5亿人左右)以前,则应坚持不懈地推行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新政”^[12]。

为什么人口社会学开始如此热烈地讨论总和生育率与中国的人口政策呢?除人口金字塔的紧缩所造成的“未富先老”问题外,就业领域的最新表现,也加深了学术界的认识。事实上,劳动力人口与少儿人口、老年人口占比状况的变化,以及劳动力人口内部形成的结构性差别,已经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当前的就业状况,使“民工荒”与“用工难”问题年复一年地发生。

二、就业需求、“民工荒”与劳资关系的调整

中国人口的转型——在持续低生育水平影响之下的转变,降低了每年新增农民工——尤其是初中文化程度农民工的供给数量。在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之后,沿海制造业企业的率先恢复、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内地的转移以及国际金融危机打击之下发达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内地产业转移速度的提升等,在增加沿海地区用工需求的同时,也扩展了中部地区和西北地区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规模。现在,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增长到2.42多亿^[13]。虽然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阴霾仍在,但中国经济的强劲恢复使2010年春节后企业对农民工的用工需求比2009年同期净增了15%。与企业原来挑三拣四的态度不同的是,大多数企业对新招聘的员工不再提特殊技能的要求——“用工荒”导致的招工竞争降低了用工门槛。

与此同时,企业之间跨地区的招工竞争还肇始于2003年以来的民工荒,逐渐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和西部地区,使农民工的就业市场从买方市场过渡到了卖方市场——这进一步增加了农民工在企业内部讨价还价的能力,也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突然令人注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表明,由于产业转移,2009年流动到东部的农民工比2008年下降了8.9%,但在中部地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却增加了33.2%,在西部地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数量增加了35.8%^[14]。东部地区农民工就业增量的放缓,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

甘满堂的研究发现,作为新工人阶层的农民工,以及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就是中国新工人阶级——农民工阶级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是农民工作为新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15]。于水和李煜玟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年龄、适应城市程度、签订劳动合同状况、体制内维权的困难、参与非正式组织与否、心理危机来源及其对政府的满意程度等,对群体性事件的发

生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工资拖欠等权益受损问题并不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最直接因素,只有当权益受损且难以在体制内维权时,农民工才选择参与群体性事件^[16]。所以,农民工的集体性行动,往往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特征。

近期农民工维权事件的高发生率,促使学术界作出非常深刻的反思。经济学家从其学术理路出发,大多认为农民工“以脚投票”能力的提高,是农民工集体维权事件多发的主要原因。如在买方市场下,对于雇主而言,“讨价还价”的农民工可能是刺儿头,由此雇主发出的行动逻辑是:如果你觉得工资低或劳动环境较差,尽管可以走人。你(农民工)不想干,别人还在厂外等待工作岗位呢!但在卖方市场下,农民工的相对短缺——或曰在既定工资水平之上农民工的相对短缺,使农民工可以不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忍气吞声——农民工完全可以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们通过“以脚投票”的方式,提高了反抗的能力,降低了反抗的成本。实际上,考察2003年以来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这个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难上升的指标,在新世纪的这十年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几乎每年都具有可见的增长。尽管工资支付中的歧视仍然存在,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从2003年到2006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达到22.0%,而且增速逐年加快”^[17]。截至2009年年底,已增长到平均2000元左右^[18],几乎接近了大学生的初职签约工资。而在有些地方,大学生初职工资还赶不上农民工工资——尤其是赶不上建筑业农民工工资。

但“以脚投票”得以发生的信息机制是什么呢?为什么城市工人在下岗失业的高潮时期没有衍生出“以脚投票”的结果?除其他因素外,农民工自乡土社会移入的那种“关系网络”和血浓于水的亲缘纽带起到了重大的信息交流作用。到现在为止,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信息,主要来自农民工自己形成的“强关系”,而很少借助于政府的就业指导信息。即使到企业求职时,农民工也不看重企业的宣传和地方政府的广告,而更看重工作在该企业农民工的口碑。择业如此,离职亦如此。为了应对企业方可能发生的不公平待遇,农民工合法而又有效的应对策略是“以脚投票”——事实上,较高的离职率即是农民工不得不采取的微观自保方法,但却在宏观上不意达成了群体性或阶级性的自保结果。作为弱者的武器,农民工不仅使用“以脚投票”策略,而且以“偷懒、开小差、假装顺从、怠工”等形式表达其反抗与不满。这种反抗与不满,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而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网络的沟通,形成集体性行为。当结社的力量难以形成时,结

构的力量却可以在工作场所形成讨价还价之力。当然,是否如甘满堂所说的那样——“农民工的阶级意识正在觉醒”还需要学术界更多的研究予以支持。但可以肯定的是,倘若体制内解决冲突的能力不能尽快被配置起来,则农民工长期借助于群体性事件来表达反抗行为的结果,会损害既有的社会稳定秩序。这些内容在蔡禾等人的研究中有着比较详细的分析^[19]。而许叶萍与石秀印则将其中的逻辑系统化^[20]。

正因为“民工荒”的影响、也由于“以脚投票”策略的实施,或者某种程度的自发性工潮打击,才使得不同就业地区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开始逐步缩小。如从2003年到2006年,东部地区农民工的月收入增长了16.8%,中部地区的增长了34.6%,西部地区的增长了24.6%^[17]。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部与西部地区农民工收入的增长速度加快了。

但收入的有限增长仍不能使农民工顺利地转变为城市市民。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只视农民工为劳动力,而不愿将其看作城市市民。王春光的研究发现,当前的农民工“既无法返回农村,又不能彻底融入城市,而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21]。如果政府仍然以土地城市化为第一选择,则半城市化问题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需要提及的是,尽管半城市化问题影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但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却是积极的。李培林与李炜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收入地位更多地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获得性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由身份歧视因素所决定的,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大约是其自身纵向的利益比较,决定了其态度的具体表现^[22]。这就是说,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为了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以及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城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一个重点,应该放在农民工收入的继续提高上,放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的继续强化上,放在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提升上。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而言,物质生活资料的满足可以最大限度地促使其形成比较积极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评价意识。

三、高校扩招、教育公平与大学生“就业难”

1999年,教育部公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时提出,2010年大学毛入学率将要达到15%左右,“十五”规划将这一目标提前到了2005年。但实际上,“跑步前进”的高校扩招,使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02年就达到了15%,也使中国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教育阶段。截至200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数接近30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而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制定的新目标是:到2020年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这预示未来在校大学生的人数仍需逐步增长。

最近几年,在各方面批评的压力下,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开始趋于稳定。如2010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为662万人,只比2009年净增22万,远低于前几年的净增人数。尽管如此,每年都扩招的高等教育,能带来教育资源共享的均等化吗?也就是说,是否各个阶层家庭的子女都有差不多同等的机会进入高校学习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均等教育权的含义。1998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首次高等教育大会上通过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提出的高等教育公平原则是指“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平等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根据唐海龙的研究,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地区分布明显失衡:2009年全国1983所普通高校,其中,北京81所,辽宁87所,江苏122所,上海61所,山东114所,广东108所,西部地区的广西59所,贵州39所,云南54所,甘肃34所,西藏6所,青海8所,宁夏13所,新疆32所。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下,为争取财政支持,各个高校不得不扩大其在所在地的招生规模,使高校在所在地的招生比例远远大于在其他省份的招生比例。另外,分省统一招生的制度安排,还使不同省份的录取比例存在重大差异。比如,清华大学2010年文史类专业招生计划分配比例是:北京18人,河南3人,天津5人,河北2人,吉林3人,海南1人。可见,录取比存在的差异会影响到教育机会的公平性^[23]。

除地区差距的影响外,学生家长的社会地位——家长的社会阶层地位,也影响到了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升学机遇。钟云华与沈红的研究表明,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仍然向优势社会阶层倾斜:越是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越容易进入高层次高校学习……“社会分层扩大了高等教育起点的不公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后果呢?钟云华与沈红说,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以及重点院校招生中的选择机制等影响了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生源的入学比例^[24]。应该说,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之下,自幼儿园开始的竞争机制使富有阶层的家庭不断将自己的子女配置进各级重点学校或名校,使教育资源较好地保障了其子女的学习成绩。因此,在进入重点大学的学生中,社会底层阶层家庭的生源占据了较低的比例。

李春玲利用2001年社会调查结果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后认为,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更易于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出身较差的家庭环境,

特别是生长于农村或来自农民家庭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其他人^[25]。李春玲在另外一篇论文的注释中引述说“一项针对高中生家庭背景的调查显示,某重点中学政府工作人员、企业人员和专业人员等优势阶层的子女,由1978年的44.7%增加到2008年的77.6%增加了33个百分点;而工人、农民子弟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42.4%锐减到2008年的5.9%降低了36.5%个百分点”^[26]。杨东平通过对10个城市40所高中的近400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城镇户口中高阶家庭的学生更多地集中在重点中学,而农业户口和低阶层家庭的学生大多集中在普通中学^[27]。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实际上也异源于高中阶段学生生源来源的不平等上。

教育扩招后仍然存在的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传导到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上,就非常显著地体现着各级各类大学就业率的差异。如985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于211大学的就业率,211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又高于普通大学的就业率。也就是说,较高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不但较大比例地占据了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高校学习,而且还通过就业又进一步占据了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就业岗位。

为了刺激大学生就业率的上升,国家出台了许多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到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作的相关文件,也出台了鼓励其自主创业的支持政策。但从最近几年大学生择业与创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并不乐观。各种调查显示,大学生理想就业地区是东部地区的大城市,而非西北地区的农村。实际上,大学生村官只能解决少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而一度产生的参军热,并不能改变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对于大学生须具备基层就业经历才能考取公务员的规定,反而强化了大学生对公务员铁饭碗的向往,使某些在职业规划中想做公务员的大学生,把“奔赴基层”视为短期性就业策略,也将“到落后地区去”视为人生履历的“中转站”或“进入政界的跳板”。另外,因为党员身份有利于到国有单位就业,故大学生党员的数量也开始迅速增长。

尽管如此,市场调查机构得到的大学生就业率仍趋下降: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独家撰写的《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全国本科毕业生半年就业率最高的专业是工学类,2007年是94.3%,2008年是90.4%,2009年是90.2%;半年就业率最低的专业是法学类,2007年是87.7%,2008年是79.5%,2009年是82.3%。不仅就业率有所降低,而且半年内的离职率也比较高:毕业于211院校本科的离职率是22%,非211类本科院校的离职率是33%,高职高专的离职率是45%^[28]。

大学生就业难,女大学生就业“更难”。2010年8

月全国妇联发布的“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状况调查”显示,91.9%的女大学生感受到用人单位的性别偏见。从平均值来看,每个女大学生投出44份简历,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意向协议,投出9份简历才可能得到一次面试机会。李长安援引就业歧视理论解释了女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认为几千年来形成的“男尊女卑”社会偏见以及女性自身的就业误区等,影响了女大学生的择业成功率^[29]。女大学生的就业难与“学得好不如嫁得好”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如果就业状况长期得不到改观,只在“道学”意义上指责所谓女大学生的道德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在大学生就业难研究中的另外一个发现是:大学生社会资本拥有量的大小,决定了其求职的难易程度及其找到的工作的质量^[30]。但需注意的是,如果社会资本的扩张取决于大学生自己的能力,则此种意义的“社会资本”无可厚非。而如果社会资本的大小取决于家长的社会地位与“人情关系”,则上层阶层会借助于自己掌握的各种合法或非资源的资源,将自己的子女以就业通道安排进“优势社会阶层”,并通过随后的培养,占据更高的社会地位——长此以往,这种不公平会固化社会的封闭性,挤压较低社会阶层成员进入社会上的通道,形成非常严重的家庭阶级继承问题,继续强化精英生产和再生产的单一性和代际复制性特征——这也恰恰是现代价值观所必须拒斥的特征^[18]。由是,望能够引起全社会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 [1]郭志刚.近年生育率显著“回升”的由来——对2006年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的评价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9(2).
- [2]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J].学海,2010(1).
- [3]顾宝昌,王丰.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4]曾毅.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 [5]郑真真.江苏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报告[Z].中国人口年鉴,2008.
- [6]宋健,陈芳.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背离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10(5).
- [7]王金营.中国未来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比较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0(5).
- [8]汪伟.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10(10).
- [9]张翼.人口结构调整与均衡性社会的建设[J].人口研究,2010(5).
- [10]蔡昉.未来的人口红利[J].中国人口科学,2009(1).

- [11]田雪原.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N]. 人民日报 2009-12-04.
- [12]程恩富, 王建新. 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与六个不同观点的商榷[J]. 人口研究 2010(6).
- [13]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2011-02-28.
- [14]中国农民工人数达2.3亿,月收入1417元[EB/OL]. <http://news.163.com/10/0323/21/62G9G1D7000146BC.html>.
- [15]甘满堂. “工荒”:高离职率与无声的抗争——对当前农民工群体阶级意识的考察[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 [16]于水, 李煜玑. 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对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 [17]农业部农村经济问题研究中心. 农民工工资收入问题的研究[J].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07(4).
- [18]张翼. 家庭背景影响了人们教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获得[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0(4).
- [19]蔡禾 等. 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9(1).
- [20]许叶萍, 石秀印. 工资决定:从统治—造反模式走向统一—协商模式——基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5).
- [21]王春光. 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实证分析[J]. 学习与探索 2009(5).
- [22]李培林, 李炜. 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与社会态度[J]. 社会学研究 2007(3).
- [23]唐海龙, 王丽丽. 谈高等教育公平及其实现对策[J]. 北京大学学报 2010(6).
- [24]钟云华, 沈红. 社会分层对联高等教育公平影响的实证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 2009(5).
- [25]李春玲. 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J]. 妇女研究论丛 2009(1).
- [26]李春玲.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张的平等化效应考查[J]. 社会学研究 2010(3).
- [27]杨东平.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28]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EB/OL]. <http://edu.163.com/special/0029314H/mycosjiuye.html>.
- [29]李长安. 歧视理论与女大学生就业[J].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08(6).
- [30]孙士杰. 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的概念模型及运作机理研究[J]. 教育与经济 2008(2).

Studies on Hot Issues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in Recent Years

ZHANG Yi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ums up the basic conclusion from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inks that China's population should be into the period of adjustment. In addition, because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t is difficult for peasant workers and university graduates to find proper jobs. The number of peasant workers is gradually reducing every year and at the time employment difficulty from university graduates have led to structural competition pressure. The data of labor and capital from peasant workers are sorted out and justice of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discussed.

Key Words: population changes; lack of peasant workers; employment difficulty from university graduates

[责任编辑、校对:王维国]